

## 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理論的論辯與意義\*

王孝勇\*\*

### 《摘要》

隨著政治局勢的變遷與新科技的高度發展，社會運動開展出不同於以往的抗爭形式，同時揭示出對傳統運動研究框架的反省有其必要性。本文主張進行社會運動研究，除了依循傳統的理论或概念來討論社會運動的存在與否，進而對其展開社會學式的、理論導向的、媒體再現的研究，若能夠正視社會運動的傳播／溝通面向，則可為相關研究另闢蹊徑。

本文首先討論 50 至 80 年代間，美國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理論論辯。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最早受到歷史學的影響，後來有學者援引社會心理學討論語藝在社會運動中的功能。70 年代以後，學者開始從語藝學中的戲劇理論擷取養分，重新界定社會運動的語藝本質，並且標榜運動論述在社會運動研究中的重要性。80 年代則有學者從詮釋學出發，建構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哲學基礎。

藉由閱讀與引介 50 至 80 年代間，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理論論辯，本文試圖對社會學、傳播學的運動研究框架進行初探性的反思，並且探討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貢獻。

在對於社會學運動研究框架的反思與貢獻上，本文認為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一) 為社會運動的定義問題提供理論資源；(二) 正視社會運動發展過程的內在複雜形構；(三) 彰顯社會運動個案的特殊性；以及(四) 建構社會運動如何召喚支持的理論基礎。在對於傳播學運動研究框架的反思與貢獻上，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正視運動論述的角色與功能，可謂替傳播學的社會運動研究開創不同的理論與研究視野。

關鍵字：社會運動研究、社會學、詮釋學、語藝學、論述、戲劇理論

---

\* 本文改寫自「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課程的讀書筆記，特別感謝林靜伶教授的指導。也謝謝徐美苓教授於本文構思期間所提供的諸多協助。本文初稿曾經於「IAICS 2005 年會暨現代化、全球化與跨文化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 年 7 月，台北)，感謝當時的評論人盧嵐蘭教授的鼓勵與建議。《傳播與管理研究》兩位匿名評審提出的具體修改方向對本文有極大的幫助，在此致上萬分的謝意。

\*\* 作者王孝勇為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班學生，e-mail: hy1227.wang@msa.hinet.net。

## 壹、前言

一般人對於「社會運動」的立即想像可能有：一群人走上街頭、上演行動劇、呼口號、高舉旗幟或標語、陳情、衝突、暴力抗爭...。這樣的聯想在 80 至 90 年代所謂的「社運黃金十年」<sup>1</sup>期間，的確是台灣民間社會常見的抗爭戲碼。但是，在「社運黃金十年」的風潮過後，社會運動的發展似乎漸漸陷入疲軟的困境，<sup>2</sup>即便偶有群眾因為對特定社會議題不滿而集結，但抗爭的形式也不如以往來得激烈。<sup>3</sup>特別是台灣政治局勢經過政黨輪替，以往社會運動與在野的民進黨結盟，向執政的國民黨進行抗爭的情形不復存在。這不禁令人懷疑：社會運動在哪裡？社會運動還存在嗎？這些疑問是從事社會運動研究時無可迴避的問題。

事實上，由於近年來媒體的高度發展與新科技的衝擊，社會運動的抗爭形式似乎開展出了不同的可能性，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網路」(internet)也成為了社會運動的抗爭場域(李承翰, 2000; 陳錦華, 2002; 游任濱, 2001)。抗爭形式的日趨多元與抗爭場域的變遷<sup>4</sup>也使得「什麼是社會運動?」「社會運動如何存在?」等認知問題值得被進一步地推敲。

本文認為當代進行社會運動研究時，除了依循傳統的概念框架來討論社會運動的存在與否，進而對其展開社會學式的、理論導向的研究，若能夠進一步反省以過去我們習以為常的框架來解釋社會運動的可能限制，則有機會為社會運動研究另闢蹊徑。而社會運動的傳播／溝通面向是傳統研究較為忽視的切點，也是本文試圖討論的重點。

有鑑於此，本文將以「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rhetorical criticism of social movements)為論述核心，藉由閱讀與引介美國 50 至 80 年代間關於社會運動語

<sup>1</sup> 蕭新煌將 80 到 90 年代稱為「社運黃金十年」。參見魏書娥(1991)。〈挫折與轉進：訪蕭新煌教授談兩年來的台灣社會運動〉，《中國論壇》，32(2): 58。

<sup>2</sup> 同上註，頁 61。

<sup>3</sup> 本文此處所指的「社會運動」，並未將台灣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所發生的幾次大規模的政治抗爭納入。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1)「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是相同或不同？學界迄今尚未形成共識；(2) 台灣兩次總統大選(2000 年、2004 年)後的幾次抗爭行為似乎與一般對於「運動」的想像有相當的差異。

<sup>4</sup> 簡單來說，可以將傳統社會運動的抗爭場域比喻為「地點」，而網路社會運動的抗爭場域則是「空間」。

藝批評的理論論辯，對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論基礎與問題意識進行初探性的反思，並探討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對傳統社會學的運動研究帶來哪些貢獻。

另外，本文認為對相關理論論辯的實質內容加以了解，也有助於我們檢討過去國內傳播學界在相關研究上的理論偏好，並在此基礎上，為傳播學的社會運動研究提供不同以往的研究取徑，這是本文的另一個研究目的。

## 貳、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50 至 80 年代的理論論辯

語藝學 (rhetoric) 的發展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就開始，語藝學試圖為人類的語藝實踐與溝通行為提出解釋。但是，使用從語藝學延伸出的理論／觀點對人類論述作系統性的分析—即語藝批評，卻是二十世紀初期的事，並且以美國為主要的發展地。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在二十世紀中葉開始受到重視，並且隨著美國於 60、70 年代興起的社會運動風潮，逐漸發展出自己特有的理論基礎與問題意識。

起先，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受到歷史學的影響，後來有學者援引社會心理學的理論，討論語藝在社會運動中的功能。70 年代以後，語藝學者選擇從語藝學中的戲劇理論 (dramatism) 擷取養分，重新定義社會運動的本質，並且標榜運動論述在社運研究中的重要性。80 年代開始，語藝學者更進一步從詮釋學 (hermeneutics) 建構社會運動的理論與哲學基礎。以下將討論 50 至 80 年代美國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理論發展，並且標示出其中主要的論辯焦點。

### 一、社會運動的語藝歷史：從歷史學借鏡

Griffin 於 1951 年所發表的〈歷史運動的語藝〉(The rhetoric of historical movements) 可以說是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試金石。Griffin 在文中對社會運動研究提出規範性的理論，並且具體建議相關研究的研究焦點、問題意識、評估判準與書寫格式。在 Griffin 之前，雖然也有學者對於社會運動的語藝研究加以討論並提出研究建議，但或許是受到語藝傳統以人物研究 (figure study) 為主流的影響，研究焦點多半放在單獨討論社運領導人的語藝—特別是語藝五大要素之一的「修

辭」的使用（例：Crandell, 1947）。<sup>5</sup>Griffin則批評單一言說者（通常是偉大言說者）的社會運動研究比較像是傳記研究（biographical approach），而傳記研究的問題在於將社會運動的意義窄化為單一言說者與既存體制之間的糾葛或拉扯。Griffin並且建議運動研究要多注意次要言說者或弱勢言說者等社會運動團體內的其他聲音，不以單一偉大言說者的論述為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唯一研究素材。

此外，Griffin（1951，p.184）並且從歷史學的觀點視社會運動為歷史運動中的一部份，主張語藝批評者的任務應該是要去找出（isolate）歷史運動（historical movement）中的語藝運動（rhetorical movement）。所謂的「歷史運動」，是「過去某段時間發生的某事。一群人對於環境感到不滿，他們起而要求環境必須有所改善，結果是某種程度的成功或失敗」，而運動的週期大致依循著發端（議題流向公眾）、語藝危機（面臨對立團體的挑戰）、消失（目標達成或失敗）三個階段。所謂的「語藝運動」是指歷史運動中的語藝面向。Griffin 還建議從事運動研究或書寫研究報告時，必須要將語藝運動置於歷史脈絡下來看，給運動一個歷史位置，如此方能從歷史的脈絡中試著摸索出歷史運動的語藝類型（rhetorical pattern），建構社會運動的語藝理論。

整體看來，Griffin 的論點有幾項特色：（一）Griffin 將語藝運動與歷史運動二分，並且認為語藝運動的研究要對歷史運動有意義，而研究者可以從運動的種類（例如：贊成運動或反對運動）、言說者的性質（例如：攻擊或捍衛既存體制）、運動的三階段這三個線索去找出歷史運動的語藝面向。（二）Griffin 的論述認為運動發展是一個線性的週期。（三）Griffin 認為語藝運動的研究必須要達到理論建構的目的。Griffin 的論點引起了相當廣大的回應與討論。

#### （一）語藝運動 vs. 歷史運動

首先，Cathcart（1972）質疑運動研究者真能從 Griffin 所說的歷史運動中找出其語藝面向？Cathcart 認為要將語藝的、歷史的二分開來有本質上的困難，且

<sup>5</sup> 語藝五大要素（five canons of rhetoric）分別為：創作（invention）、排列（arrangement）、修辭／風格（style）、記憶／背誦（memory）、與發表（delivery）。詳見林靜伶，1993: 73-75。

將造成研究者額外的負擔。

### (二) 運動的線性史觀

再者，Cathcart (1972) 認為 Griffin 對運動「線性發展」的認知忽略了運動本身的循環性 (cycle)。而將運動定義為「過去某段時間發生的某事」將使我們看不到那些正在進行中的運動。關於這一點，Sillars (1980) 也有類似的看法。Sillars 認為過度強調運動的線性其實流於一種常識性的認知 (common sense)，這樣的認知雖然不一定毫無價值可言，但不可諱言的是，對於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而言，這不該被視為唯一的詮釋運動的基礎——特別是語言文字的使用本身即有相當大的變動性與可能性。

### (三) 理論建構的策略

其三，Griffin 認為對語藝運動的研究必須要放在歷史的脈絡下來看，才可以找出運動的語藝類型，藉以建構運動的語藝理論。而這樣的呼籲引起了後來學者爭議理論建構究竟應該採取理論導向 (etic approach) 或個案導向 (emic approach) 為策略？

Smith (1980) 回顧 Griffin 自 1951 年發表文章以降的社會運動研究，發現社會運動的語藝歷史研究雖然朝向多元的方向發展，但也是一片混亂，甚至沒有形成互相競爭或對話的學術典範。Smith 於是援引了社會心理學、歷史學、文學批評等學門的相關理論，評估它們對於語藝歷史研究帶來的貢獻，進而討論語藝歷史的研究可以如何建立一個足以有效解釋社會運動因果關係的理論。Smith 也建議社會運動的語藝歷史的研究可以從一個特定的議題開始著手，在累積了一些研究成果之後，再作跨文化、跨區域、跨時間的社運語藝比較，他相信這是社會運動的語藝歷史研究應該努力的方向。

相對於 Smith 傾向採取理論導向的研究策略，Andrews (1983, p.68) 有較為不同的看法。Andrews 主張太快帶進理論去看待運動會框限住研究者的視野，如此建構的理論又怎能含括人類的行為？Andrews 進而主張「什麼樣的環境／情境引發出什麼樣的語藝行為」才是運動研究者必須首要關注的焦點。這裡必須說明

的是，Andrews並不反對理論建構的重要性，他不同意的是太快帶入理論來看待運動。所以，我們或許可以說Andrews比較傾向採取個案導向的研究策略。<sup>6</sup>

#### （四）社會運動？集體行爲？

除了以上幾個論辯焦點，若是我們從Griffin發表文章的時間點上來看，還另有一番耐人尋味之處。由於美國的社會運動風潮始於 60 年代，因此可以推知Griffin所看到的「運動」其實應該不是後來學者所討論的諸如反戰運動、民權運動、第二波婦女運動、同性戀運動、嬉皮的反文化運動...等「社會運動」，充其量只是一些尋求改變的「集體行爲」。<sup>7</sup>因此，Griffin的理論在適用性上恐怕相當值得再評估。比方說Cathcart（1972）就認為Griffin的理論架構無法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或在哪個時間點上，集體行爲可以被視為社會運動。

儘管 Griffin 在 1951 年發表的文章受到了相當大的批評，但是一般認為Griffin認為運動必須要置於歷史脈絡下來理解，的確可以幫助我們更仔細地思考社會運動的歷史意義，並且對於運動論述的可能流變有具體的詮釋基礎。此外，Griffin也修正了過去關注個人言說者論述的語藝傳統，擴大了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研究視野。不過，由於Griffin關注的重心比較多放在社會運動整體的歷史而非運動論述，所以嚴格來說，Griffin此時尚未達到從語藝的觀點去看待社會運動——儘管他使用了「語藝運動」這個字眼。

## 二、語藝在社會運動中的功能：社會心理學的觀點

<sup>6</sup> 理論導向與個案導向是語言學家Kenneth Pike爲了描述、重建語言系統所提出的兩種分析途徑。除了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語藝批評（rhetorical criticism）約在 80 年代也有過類似的論戰。Black（1980）傾向採取個案導向的研究策略，並認為如此方能彰顯研究者作爲一個「行動者」的主體性，也才能夠「由系統內部了解系統」；Leff（1980）則認為個案導向將使得研究者的主觀意識被過度標榜，以致於個案本身的特殊性被漠視，他因此主張採取理論導向的研究策略。中文論述對此論戰有較爲清晰的介紹與評述者，有林靜伶（2000）的專書《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頁 151-154。本文的第三部分也將對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sup>7</sup> 從外在的政治、經濟因素來看，美國 60 年代以降的社會運動風潮起源於二次世界大戰、韓戰以及共產主義、納粹與帝國主義的崛起，使得啓蒙運動以來對於社會中必須存在著一股大一統力量的主張受到了第二次的挑戰（第一次的挑戰是人們對於工業革命所抱持的願景的幻滅，因爲工業革命並未帶來富庶與美好的社會，反而造成更嚴重的貧富差距與階級衝突），逐漸興起的一股離心的力量。一般認為這股力量與智識上的後現代思潮密切相關（Fishman, 1999: 31-72）。

相較於語藝歷史的研究傾向從巨觀的、歷史的面向替社會運動找歷史位置，Simons（1970, 1972）則從社會心理學出發，探討語藝的「說服」功能在社會運動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Simons（1972）首先歸納過去大部分的社會運動研究，並且分為兩大類：一是系統導向的（system-oriented）；二是行動者導向的（actor-oriented）研究。系統導向的研究預設既存體制在某種程度上有其合理性與合法性，所以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s）以及在社會衝突中經常出現的強制性的（coercive）言說往往被貼上一個負面的標籤。行動者導向的研究則主張既存體制無法平等地滿足不同人的需求，所以衝突是必要且必然會發生的。衝突狀況下的論述形式雖然經常是強制性的，但行動者導向的研究相信在抗爭時，強制性的說服反而可能比較有機會引起既存體制的注意，進而達到抗爭的目的。所以社會衝突有其正面且積極的意義。

Simons（1972）接著批評過去語藝學者未將爭議（controversy）與衝突（conflict）的差別弄清楚，誤以為所有的不滿都是「爭議」，都可以藉由對話、討論...等靜態的方式獲得解決，忽略了許多不滿之所以後來會形成社會運動，主要是有一些無法經由對話而解決的實質利益或道德層面的「衝突」。Simons（1972）還批評過去研究過於重視既得利益者的語藝（系統導向的研究），而這背後其實是政治的產物，學術淪為替既得利益者代言。

在這些批評的基礎上，Simons（1972）建議採取「雙重的觀點」（dual perspective），一方面檢視既存體制如何藉由語言文字規範（regulate）、控制社會衝突，另一方面關注行動者如何在衝突情境中放大（maximize）、爭取自己的利益以及衝突如何被行動者藉由語言文字的使用給煽動、維持或惡化。<sup>8</sup>而Simons比較看重的是後者（但並不是說前者的取徑沒有價值），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對於行動者導向的研究取徑有更為細緻的討論。

<sup>8</sup> 約與Simons同一個時期，Bower, Ochs與Jensen於1971年出版了《抗爭與控制的語藝》（*The rhetoric of agitation and control*），為第一本同時關注抗爭與控制機制雙方的語藝的專書。本文所引述的資料為該書的第二版，1993年出版。

Simons (1970) 在〈語藝要件、問題與策略〉(Requirements,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一文中，特別以改革與革命型的運動 (reformist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為例，討論語藝在社會運動中可以在什麼地方展現？以什麼形式展現？Simons 並且引進社會學理論中「領導者中心」的概念，思考運動領導人如何經營其語藝資源。在「語藝要件」(rhetorical requirements) 的部份，Simons 討論社會運動領導人對內如何凝聚支持者的認同，對外如何獲得廣大社會結構成員的支持。在「語藝問題」(rhetorical problems) 的地方，Simons 思考運動領導人在抗爭時可能會遇到哪些問題，以及領導人必須具備哪些能力來因應問題。在「語藝策略」(rhetorical strategies) 的部份，Simons 指出了不同的語藝策略 (例如：溫和的、激進的、折衷的) 可能可以在哪些衝突情境中使用。

通篇看來，Simons 對於運動領導人的語藝作了相當細緻的討論。相較於語藝歷史的研究取徑而言，Simons 的論述更關注社會運動中的語藝面向。但是，Simons 的說法在定義上的不明確與研究視野上的侷限也招致了一些批評。

#### (一) 社會運動與集體行為的區分

由於 Simons (1970, p. 3) 接受社會學對於社會與運動的預設，因此他將運動定義為「一種為了重建社會道德和價值觀，而訴諸行動的體制外的集體行為 (uninstitutionalized collectivity)」。這樣的界定雖然點出社會運動的出現來自於一群人的不滿在體制內無法獲得解決，因此選擇在體制外抗爭，但是社會學對於集體行為與社會運動的界定不明仍是 Simons 所面臨的證明的負擔 (burden of proof)。Cathcart (1972) 即批評 Simons 的論點並未回應「哪些集體行為是運動？哪些不是？」這個最基本的問題。Cathcart 並且說這個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我們很可能誤把既存體制所發起的某些調整或「運動」(evolving status quo) 也看作是社會運動。

#### (二) 研究的視野

在研究視野上，Simons 以社會心理學上「領導者中心」的概念來研究社會運動的語藝，同樣也有可能將社會運動簡化為運動領導人與既存體制兩造間的衝

突。此外，Simons過於看重運動領導者的語藝似乎忽略了社會運動必須放在「社會」此一鉅觀的、生活世界的場域來思考。正如同Cathcart (1972: 85) 的批評，社會心理學傾向從與「個人行為」的對照中理解「集體行為」，不傾向將「集體行為」放在較大的「社會行為」的架構下來理解。<sup>9</sup>

儘管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取徑主要有上述兩點限制，但是藉由社會心理學細緻地討論領導者如何經營其語藝資源，同時透露出運動論述的重要性逐漸受到正視。這點對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在理論發展上，可謂邁出了一大步。

### 三、社會運動的「對立語藝」：戲劇理論的觀點

Griffin 於 1951 年的文章中援引歷史學的觀點研究語藝運動的歷史位置之後，他也實際從事了一些社會運動的個案研究。在研究過程中，Griffin 漸漸發現似乎並不是每一個運動的發展都必然是經過發端、語藝危機、消失這三個階段；另外，要找出運動的語藝類型也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Griffin 於是重新檢討了歷史學取徑的限制 (Brock, Scott, & Chesebro, 1990)。

1969 年，Griffin 在〈運動語藝的戲劇理論〉(A dramatic theory of the rhetoric of movements) 一文中，揚棄了過去以歷史學的觀點研究語藝運動的主張，轉而採取語藝學者 Kenneth Burke 的「戲劇理論」及其分析架構來研究社會運動的語藝。Burke (1969b) 的戲劇理論指陳人生不是如戲 (as drama)，戲劇不是人生的隱喻，人生就是戲 (life is drama)。此外，語言符號的使用是一種有目的的行動，語言符號中所呈現的戲劇內涵透露出言者的動機 (Burke, 1969a, 1997; Nichols, 1997)。Griffin (1969) 從戲劇理論來定義社會運動，引起了後續學者從語藝的觀點進一步思索社會運動在形式 (form) 上展現的戲劇性。

<sup>9</sup> 我們可以從這點檢討來思考林福岳 (2002) 的論文。林福岳借用社會心理學的「共識動員論」(consensus mobilization)，研究美濃社區如何藉由論述形塑內部對於「反對興建水庫」的認同。儘管林福岳指出共識動員論是社會運動與傳播的交會點，亦即傳播／溝通在社會運動中扮演著意義建構的關鍵角色，但是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視野侷限在「形塑內部認同」，因此問題意識必須緊扣「社區傳播」與「認同建構」這些面向 (這是該文的主旨與主要貢獻)。但是若從更巨觀的視野對運動的社會意義進行發問，社會心理學及其相關理論的適用性則明顯不足，所謂的「意義建構」、「傳播／溝通」也無法推論至「透過語言文字的使用以召喚他人或一般大眾的支持」此一重要面向。關於此點，本節的第三部份「社會運動的『對立語藝』：戲劇理論的觀點」會加以討論。

Cathcart (1972) 認為過去歷史學、社會心理學對於社會運動的界定有一個共同的盲點，即是我們不知道在哪個時間點上，集體行為可以被視為社會運動。Cathcart 於是發問：什麼是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值得關切的面向？當我們研究社會運動時要檢視、捕捉什麼東西？什麼是社會運動？如何辨識社會運動？Cathcart 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語藝的觀點重新界定社會運動。對 Cathcart 而言，由於社會運動必須依賴語言文字（包括口語的與非口語的）來形塑或召喚他人的認同，所以社會運動的本質是語藝的，社會運動的形式即是語藝的形式。

在立論上，Cathcart (1972) 同意Griffin (1969) 以戲劇理論來定義社會運動。Cathcart引述Griffin的話說：(一)所有的運動基本上都是政治的，所謂的「政治」來自統治者與抗爭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而「戲劇」是「政治」的要素之一，戲劇通常包含了某些衝突；(二)所有的運動基本上都是道德的，為了獲得救贖、完美與重生，運動會做出道德上的指控，而道德的指控會迫使被控訴的一方（通常是既存體制）不得不回應，道德的衝突也很難達到妥協；(三)研究運動就是研究戲劇，戲劇的五因 (pentad)<sup>10</sup>可以幫助我們辨識社會運動的發端。

在以上的理論基礎上，Cathcart (1972, p.87) 進一步定義社會運動為「一種因為道德衝突而產生的辯證的緊張關係」(a dialectical tension growing out of moral conflict)。Cathcart 還指陳由於社會運動立基於道德衝突，因此必然會產生「對立語藝」(counter rhetoric)。對立語藝除了可以幫助我們辨識社會運動，也指出了社會運動在本質上與集體行為或既存體制內發起的「運動」之間的差別。

社會運動與集體行為或既存體制發起的「運動」之間的差異一直是 Cathcart 關心的課題。Cathcart (1990) 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過去社會運動研究並未從語藝學定義社會運動，導致經常無法區分所謂的「運動」究竟是集體行為？是既存體制的調整？或是體制外的社會運動？Cathcart (1990, p. 369) 並且將維持既

---

<sup>10</sup> 戲劇五因指場景 (scene)、行動 (act)、行動者 (agent)、方法/手段 (agency)、目的 (purpose)。五因的兩兩組合可以產生二十種比例 (Burkenian ratios)，用以了解五因之間的相互關係。Cathcart (1972) 並且指出運動的發端不脫「方法—場景比例」與「方法—行動比例」這兩種論述形式，只要找出這兩種比例即可確認運動已經發生。

存體制的語藝命名為「管理的語藝」(managerial rhetoric)，將挑戰既存體制的語藝命名為「對立的語藝」。他認為只有對立的語藝可將衝突升高到道德層次，對既存體制的根本基礎加以抗拒或進行挑戰，也只有對立的語藝可以讓抗爭者有意識地質疑那些習以為常的信仰、價值、態度，進而和既存體制「戲劇性地疏離」(dramatize the complete alienation of the confronter)。所以，對立的語藝是社會運動必要的語藝形式。

整體來說，Cathcart 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延續 Griffin 後期的論點，對社會運動下了一個語藝學的定義，並且主張「對立」才是社會運動語藝的本質與形式。另外，Cathcart (1980) 認為道德衝突而引發的辯證的緊張關係將在社運團體、既存體制、公眾三者之間發酵，因此主張同時分析運動團體、既存體制、公眾之間的語藝。這樣的主張除了擴大了運動論述的取材範圍，更明白標榜出運動論述在社會運動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是，Cathcart 的論點也有相當多值得商榷之處。

#### (一)「對立」是運動語藝的必要形式？

Cathcart (1972, 1980, 1990) 的幾篇文章裡，「對立語藝」都是他所討論的核心命題。雖然 Cathcart (1972) 認為仍有其他語藝形式可以被追尋或摸索，但是他堅持「對立」是社會運動語藝的必要形式。「對立」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語藝形式，的確頗能反映出某些社會運動採取較為激烈的 (militant) 的抗爭方式，但是這樣的預設恐怕太過狹隘，一些不被媒體、公眾或既存體制重視且未引發對立語藝的社會運動將被排除在外。Smith 與 Windes (1975) 即指出將社會運動界定為「與既存體制衝突」會產生兩種情況：其一，研究者將只關注社運團體與既存體制的衝突，而忽略運動的其他意義 (例如：意識喚起或提出創新的主張)；其二，社運團體發起的行動之意義可能會被扭曲為只為了與既存體制衝突，為反對而反對。

#### (二) 與歷史學、社會心理學劃清界線的合理性？

由於急著替社會運動下一個語藝學的定義，Cathcart (1972, 1980, 1990) 幾乎完全否定了歷史學與社會心理學對於早期社會運動語藝研究的貢獻。這樣的立

場引發後來學者質疑是否劃地自限？例如 Wilkinson (1976: 91) 就認為，Cathcart 對於社會運動的定義是不完全的 (incomplete)，Cathcart 停在他應該繼續往前走的地方。

Wilkinson (1976) 指出，較為理想的界定方式，一方面不應該完全放棄歷史學與社會心理學的貢獻，同時也必須意識到從語藝學定義社會運動有其必要性。Wilkinson (1976, p.91) 並且給了社會運動這樣的定義：藉由語言策略這個社會中重要地 (significantly) 發聲管道，社會運動會經歷道德衝突而來的持續性辯證緊張，於是起而抗爭，並誘使他人直接或間接的合作，試圖影響既存體制。從 Wilkinson 的定義中可以看出，過去歷史學與社會心理學對於社會運動的討論成果，例如，社會運動會藉由語言策略來發聲，社會運動的實踐場域必然在歷史與社會之中。此外，Wilkinson 的定義也包括了 Cathcart 對於社會運動來自於道德衝突的辯證緊張這個說法。

對於上面這些批評，Cathcart 仍然堅持自己的論點。Cathcart (1990) 認為對運動下一個定義必然會有所取捨。但是，必須去思考的是我們要灑一張大的網去捕捉到社會運動所有的語藝形式？或者是要在具體的研究焦點下，追尋社會運動特殊的語藝形式？而他認為後者顯然比較吸引他。

無論贊不贊成 Cathcart 的立場，論者多半同意「對立」的確是運動常見（但並非唯一或必要）的語藝形式（例如：Brock et al., 1990; Sillars, 1980; Wilkinson, 1976）。Wilkinson (1976) 並且認為就這點來看，Cathcart 對運動的觀察十分精準。

### （三）本質論的社會運動？

在 Cathcart 的論述中，社會運動似乎是一個「就在那裡」(out there) 等著被發現、被描述的現象。社會運動有其特殊的語藝形式可被辨識。但是，實際從事運動研究時，研究者真能從 Cathcart 的建議中辨識出一個「就在那裡」的社會運動嗎？或者我們可以如此問：社會運動的定義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定論嗎？社會運動是一個本質存在的現象嗎？如果社會運動是本質存在，那麼台灣今日所面臨到

的社會運動疲軟或「消失」意味著社會運動真的不復存在？80年代開始，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者引進了詮釋學的觀點，並建構社會運動語藝批評背後的理論與哲學基礎，有助於解決上述的疑問。

#### 四、作為現象或意義的社會運動？－詮釋學的觀點

相較於Cathcart對社會運動下了一個相當嚴格的定義並積極與其他學門做出區隔，80年代開始，有學者轉而從詮釋學<sup>11</sup>的角度再探社會運動的定義問題。

Sillars (1980) 認為過去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理論貢獻在於：(一) 揭露出社會力量 (social forces) 對社會運動可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二) 關注運動論述；以及 (三) 強調社會運動內部與外部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Sillars 也檢討過去的相關理論在實際分析上可能的局限，特別是 Cathcart 對於社會運動的定義太過天真，只看到其中一種社會運動的語藝形式，可以說是一個極端的版本。

Sillars (1980) 指陳所謂的「對立」在不同人的認知裡可能有不同的認定。對某些人而言，某種形式的對立是一種抗爭的表現；對其他人而言，則可能代表一種支持既存體制的行爲。

為了解決上述的困境，Sillars (1980, p.19; p.30) 主張灑一張最大的網，給社會運動下一個「暫時的定義」(a working definition)，這個定義指出社會運動並非本質存在，研究者在實際研究的過程中可依照研究者個別的、不同的研究目的來對社會運動的定義做出調整。也就是說，社會運動是研究者在認知層次上的集體行動，研究者必須從運動中舉出對自己最有用的 (useful) 語藝事件、語藝衝突或語藝策略來舉證自己論述的可信度，而說服別人同意自己的觀點或界定運動的方式是研究者的任務。從Sillars的論點來看，社會運動並不是全然存在於外在經驗世界的現象，Sillars把相當大的權力交付給研究者，由研究者小心謹慎地 (careful) 去舉證社會運動的存在，不意圖將研究成果概推，同時也能夠試圖提

<sup>11</sup> 詮釋學的範圍相當廣泛。語藝學者雖然借用詮釋學的觀點，但其實並未說明引自哪一派詮釋學的觀點，而是從詮釋學的一些基本原則作為理論依據。所以，不妨將此處所說的詮釋學看作一種較為廣泛的、廣義的理論視野，涵蓋現象學傳統、詮釋學傳統以及具有詮釋學傾向的相關理論。類似的對於「詮釋學」指涉範圍的主張，可以參考鄒川雄，2005: 21，註釋 1。

供學界或運動成員有用的 (useful) 的資訊。<sup>12</sup>

必須說明的是，Sillars (1980) 雖然採取詮釋學的觀點，但是並非意味著他對於運動的「事實性」全然否定。Sillars 認為運動是「事實與觀察的結合」(1980, p. 27)。所謂的「事實」，肯定了對運動外在形式 (例如：對立) 的探索有其意義，所謂的「觀察」，則可說是正面看待研究者在辨識社會運動、研究運動語藝時的主觀性。

除了 Sillars (1980)，McGee (1980) 同樣採取了詮釋學的觀點反思社會運動的本質與定義。McGee (1980, p.233) 不直接定義社會運動，反而反覆論證「社會運動是一組意義或是一個現象？」McGee (198, p.233) 說，社會運動存在於人類經驗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重點在「如何存在？」若社會運動是直接地 (directly) 存在於人類經驗，則它是現象；若社會運動是推論性地 (inferentially) 存在於人類經驗，那麼它是一組意義、一種詮釋)。McGee 並且指出當我們用不同的語彙 (例如：抗爭、暴動、示威...) 去描述社會運動時，難道不是代表著我們對於運動有不同的詮釋？從這個面向來看，McGee 認為對於社會運動不同的界定來自於學門訓練的差異，並非來自於社會運動本身。因此，社會運動的語藝理論只有在人類意識的層次上才有理論建構的可能性。

另外，McGee (1980) 也從「運動」(movement) 這個字的字源與歷史發展看社會運動的意義，從中導引出唯物論 (materialism) 與唯心論 (idealism) 對於社會運動的不同看法。對於 McGee (1980, p.237) 來說，古典馬克思主義下的唯物論看重變動／抗爭的具體、外顯面向並非完全沒有價值，因為社會運動仍或隱或顯有其外在特質可以被找尋。但是，社會運動研究其實是對現象的詮釋，這樣的詮釋較多時候受到研究者世界觀、認識論的影響。所以與其說社會運動是一種現象，不如說它是一個論點 (arguable claim)，是研究者在其研究目的的基礎

<sup>12</sup> 將舉證的權力與責任交付給研究者，並不意味著研究者可以如脫韁野馬般毫無約束地界定社會運動。Sillars 舉出研究者在界定社會運動時必須符合「有用」(usefulness)、「小心謹慎」(carefulness) 這兩個判準。由於這部分涉及方法論上的議題，本文為求焦點明確以及討論的流暢性 (本文此處的重點擺在強調反本質論的社會運動想像)，在此暫不對此深入探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林靜伶 (2001, 2002) 的國科會結案報告。

上對現象下的判斷。

McGee (1980) 和 Sillars (1980) 基本上均從詮釋學反省社會運動的本質與定義問題。對於他們來說，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研究目的，不僅僅在找尋運動的「現象」或語藝形式，更在研究者主動發掘社會運動的存在、詮釋社會運動的意義。正如同 McGee (1980, pp.243-244) 下的結論，社運語藝的研究目的在於證明 (to prove) 而非預設 (to presume) 運動的存在；社會運動的存在是研究的結論，並非研究的前提。

### 參、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意義與貢獻

本文藉由討論 50 至 80 年代美國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理論論辯，試圖思考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對於社會學與傳播學從事社會運動研究時帶來哪些啟發。以下，先對於 50 至 80 年代美國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理論辯論作一綜合性的整理與討論，接著反思其對社會學與傳播學運動研究框架帶來的貢獻。

#### 一、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之理論意涵

從理論發展的系譜上來看，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最早受到歷史學的影響，看重社會運動整體的歷史。雖然這一派的學者意識到運動論述的重要性，但是他們的研究重心仍擺在對語藝運動下一個歷史定論。此外，儘管歷史學的取徑指出研究者必須找出歷史運動的語藝面向，但是將語藝運動與歷史運動二分、線性史觀的思考模式、理論建構的策略、集體行為與社會運動的界定不清均是此一研究取徑的困境。

相對於語藝歷史的研究傾向從鉅觀的、歷史的角度看待社會運動，社會心理學的取徑則以「領導者中心」的概念，討論運動領導人的特質以及語藝在社會運動中的功能。但是，社會心理學在討論集體行為與社會運動時，與歷史學取徑一樣沒有意識到兩者的差別。另外，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取徑雖然比較重視社會運動的語藝面向，但是由於其並未將社會運動放在較大的社會脈落下來思考，而是傾向從與「個人行為」的對照中去理解社會運動，這點導致其研究視野有過度狹隘

之虞。

真正從語藝學思考社會運動的始於 Griffin (1969) 援引戲劇理論給社會運動下了一個語藝的定義。Griffin 的論點被 Cathcart 過度擁抱，建構了社會運動的語藝形式（即是「對立」）。但是，Cathcart 這個「極端的版本」同樣也招致許多批評。比方說，Wilkinson (1976) 認為 Cathcart 極力撇清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與其他學門的社會運動研究的差異忽略了歷史學與社會心理學的可能貢獻；Smith 與 Windes (1975) 認為「對立」並不一定是運動論述必要的抗爭策略。另外，Cathcart 在定義運動時所採取的本質論的立場也引起後來學者從詮釋學的觀點再探社會運動的本質與定義問題。

Sillars (1980) 與 McGee (1980) 均認為社會運動雖然有其外顯的語藝形式，但是在進行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時，社會運動是否本質存在並非一個首要的問題，重要的是研究者對於運動的命名、界定、認知，而這樣的命名、界定、認知其實有相當大的部份來自研究者的價值觀與立場。據此，他們指出與其說社會運動是一個現象，不如說它是一組意義。

本文同意歷史學的研究取徑可以幫助我們對於社會運動的歷史演進過程有深刻地認知，並藉此作為詮釋運動論述的基礎。但是本文並不同意語藝歷史學者對於社會運動生命歷程的線性預設，因為社會運動的發展有其循環性，社會運動語藝批評也不一定非得從歷史檔案中取得研究材料，發展中的社會運動同樣可以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個案。本文也意識到社會心理學取徑對於過去社會運動語藝批評過度關注既存階級語藝的不滿，以及社會心理學對於社會運動領導人的語藝要件、語藝問題、語藝策略做出的細緻討論，但是本文並不同意將社會運動窄化為運動領導人與既存體制間的拉扯。而 Cathcart 對於社會運動語藝形式的探索有其意義，但是 Cathcart 太過嚴格的定義方式同樣有可能忽略掉社會運動論述的其他語藝形式。

本文比較傾向贊同 Sillars (1980) 與 McGee (1980) 從詮釋學的觀點思考社會運動的本質與定義。從詮釋學出發，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除了正面肯定摸索某

些外在的語藝形式（例如：對立）有其意義，另一方面，也肯定了社會運動研究者的主動／主觀角色，這應是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其中一項特色。此外，詮釋學的觀點也提供研究者實際進行社會運動語藝批評時，一些理論／概念上的指引或反思的機會。

## 二、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對社會學運動研究框架的反思與貢獻

本文認為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有助於我們對社會學以及過去傳播學在從事相關研究時的可能侷限進行初探性的反思，並為相關研究另闢蹊徑。在對於社會學運動研究框架的反思上，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主要有以下四點貢獻：

### （一）為社會運動的定義問題提供理論資源

社會運動的傳統研究取徑主要來自社會學。社會學視社會運動為「持久性的」集體行為（謝高橋，1982），而集體行為是一群人對自己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處境感到不滿，於是起而抗爭的一種行動。從研究立場來看，不難發現儘管社會學意識到要對社會運動下一個「定義」是相當困難的事，但多數社會學者在從事社會運動研究時仍然傾向從「定義」出發，進而鋪陳其論述（例：高承恕，1990；張靜倫，1999；蕭新煌，1990）。然而，當我們先預設了一個先驗的「定義」隨後在進行研究時，這樣的「定義」真能反映社會運動的真實樣貌？這樣的「定義」恐怕不是沒有問題的。比方說，蕭新煌（1990）以「社會問題」為界定社會運動的前提，認為社會運動的發生必然是因為早就有一個就在那裡的「社會問題」存在。這樣的界定方式一方面在認識論上可能流於本質論，另一方面在實際觀察運動時，凡是不符合社會學定義（例如：不具備街頭爆發性抗爭的運動）或不被大眾媒體所重視的「社會問題」則不會被社會學的運動研究所重視。謝文華（2002）所關注的客家母語運動比較屬於意識喚起的社會運動，缺乏暴力式的訴求；黃應貴（1990）研究的東埔社布農族人的新宗教運動則明顯不具「新聞性」，這些與社會學對社會運動下的「定義」或多或少有所不同，但事實上的確存在且值得被探討的社會運動無疑地將被社會學研究框架排除在外。

除了「定義」本身可能的狹隘，社會學對社會運動下的「定義」往往也不夠精確或清楚。比方說基於常識，我們認為「社會運動」與「集體行為」有所不同，但在社會學的相關文獻中，卻很難了解兩者的差異為何（例：Smelser, 1991／陳光中、秦文力、周儵嫻譯，1995）。正是因為「定義」的不明確，社會學界對於社會運動的界定常常出現互相矛盾的狀況。例如楊國樞（1990）認為運動只要具備了「涉及特定的社會問題或價值觀念」、「持有鮮明而突出的意識形態」、「引發持久性的群眾參與及行為」，即使由官方所推動仍可稱為一種社會運動。這樣的說法明顯沒有認知到即使是既存體制也會發起一些體制內的改革或「運動」，而社會運動的動員應當是來自於體制外這樣的基本認知。

然而，若我們從上述的批評來概括性地指控社會學在社會運動的定義問題上抱持著相當狹隘的看法，恐怕也言過其實。其實社會學在其研究中，對於社會運動的「定義」也曾納入非本質論的看法。Taylor（1989）以 1945 至 1960 年代間美國婦女運動的發展為例，反駁一般認為美國婦運在 1920 年爭取到投票權之後即中止，一直到 1960 年代之後才又因為爭取平權修正案的通過而復甦的看法。Taylor 藉由觀察美國某些基進女性主義團體的組織結構、管理模式、信念，指出婦女運動從未中斷，40 與 50 年代看似沒有婦女運動，但事實上只是反映出婦女運動在外在政治氣候較為保守與封閉時，會呈現「延滯狀態」（abeyance）。而延滯中的婦女運動在時機成熟之後，會成為下一波運動的主要資源，並在行動者網絡的分享、運動目標與運動策略的提供、創造集體認同等方面提供具體的奧援。

雖然 Taylor（1989）的分析沒有標示自己的反本質論立場，但是她藉由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ies）與組織理論試圖發展出可用來解釋社會運動延滯狀態的概念架構，並駁斥一般對於美國社會運動發展的普遍思考模式，可以說是具體實踐了 McGee（1980）與 Sillars（1980）從詮釋學對社會運動的定義問題重新意義化的相關主張。Taylor 也以經驗性的分析對延滯中的婦女運動提出舉證與論證。

有鑑於社會學在「定義」社會運動時產生的種種問題以及社會學研究中曾經

納入的對本質論的修正，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主張社會運動並非本質存在，社會運動的存在是一個研究結論、而非研究前提，所以研究者可以依照自己的研究目的合理化（*argue*）某個現象事實上是社會運動，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語藝批評。此種說法可說是在某種程度上為社會運動的定義問題提供了理論資源，也使得不完全符合主流社會學定義的社會運動仍然有被討論與研究的正當性。

而在實際進行研究時，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提供的新意為：吾人可經由觀察與經驗性的分析去辨識或說明一個抗爭行動算不算是社會運動。也就是說，社會運動的「定義」是可在研究中不斷被提問與思考的問題。

### （二）正視社會運動發展過程的內在複雜形構

從研究策略來看，社會學在研究社會運動時多半援引Mauss（1975）週期理論的五個階段，即發端（*incipiency*）、集結（*coalescence*）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分化（*fragmentation*）、消失（*demise*），對運動的歷史或生命歷程進行歸納與詮釋（例：蕭新煌，1990；顧燕翎，1987, 1993a, 1993b），視社會運動的發展為一線性的抗爭過程，<sup>13</sup>並在此基礎上建構社會運動發展的巨型理論。

而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自 Cathcart（1972, 1980）在 Griffin（1969）的基礎上指陳社會運動會在運動內部、既存體制、公眾三者之間產生一種辯証的緊張以來，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對於運動的線性史觀一直抱持著敵對的態度。再者，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試圖藉由關注不同發聲位置的言者在不同的語藝情境或困境下的語藝策略（例如：溫和的、管理的語藝；激進的、對立的語藝），探索社會運動外顯的內在肌理以及運動本身的循環性，可以說提供了傳統社會運動研究另一種方向，亦即正視社會運動發展過程的內在複雜形構。

### （三）彰顯社會運動個案的特殊性

從發問方式來看，社會學對於社會運動的提問主要在探索社會運動發生的原因、意義，並且從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層面來加以討論，試圖給社會運動一

<sup>13</sup> 雖然蕭新煌（1990: 40）曾經指出社會運動的「變形」（例如：有些運動可能又再死灰復燃）也要加以重視，但他仍在Mauss的線性架構下討論社會運動。

個歷史位置（例：王振寰，1991；高承恕，1990；蕭新煌，1989）。為了使其論述更具說服力，社會學者遂引用諸如相對剝奪論、民間社會論、資源動員論、新社會運動理論來強化其論述基礎（例：王甫昌，1999；張茂桂，1994；Philips, 1991）。

本研究並不否認把社會運動放在歷史脈絡下來思考將有助於對社會運動的形成、特質、走向有更為結構性的思考。但是，以西方既有的理論來為社會運動的起因找尋理由，則可能落入因果的思考模式，預設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必然有其理論上的原因或意義，且在此預設之下，討論社會運動如何動員以及動員可能達到哪些目的。這樣的提問方式推到極致，其實是將社會運動視為印證既有理論的「例子」或「事件」，社會運動的特殊性將被漠視。<sup>14</sup>

以後設的角度來說，社會學的運動研究偏向理論導向，亦即以特定的理論為依據或準則，找尋經驗資料中符合理論期待的證據。理論導向的研究最被批評之處，即是機械性地套用既定的理論，導致相關研究只是以不同的個案來服務既有的理論。

有別於傳統社會學研究傾向從理論觀看實際的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則從實際的社會運動來看社會運動理論，亦即標榜個案導向的研究。在具體的研究步驟上，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通常標榜現象學所說的「回歸現象本身」<sup>15</sup>、「互為主體的了解」<sup>16</sup>，先觀察社會運動的特質，並在觀察到一個階段，分析重

<sup>14</sup> 必須說明的是，社會學也有許多研究並不是本文此處所說的「推到極致」的體現。例如Jenson（1985）以新社會運動理論（new social movements theories）探討法國婦女運動如何創造新的集體認同，挑戰既有對於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的詮釋，並進一步鬆動主流政治論述的合法性基礎。Jenson雖以特定的社會運動理論為基礎，但是在具體的分析中，卻是高度標榜個案的主體性。她透過重新問題意識化「集體認同」以定義「新社會運動」為「創造女性性別自覺意識的政治實踐」，並藉由探討70年代興起的新左派思潮對法國婦運帶來的啟發，分析婦女運動如何透過政治鬥爭擴大了政治論述的普遍內涵以達成其（墮胎合法化的）訴求，可以說是一方面繼承了新社會運動理論訴諸特定價值或議題的主張，另一方面重新評估了新社會運動理論在運動組織上鼓勵離心化的理論適用性。所以，下面將指出本文傾向將理論導向與個案導向的差異定位為一種相互補足的關係。

<sup>15</sup> 「回歸現象本身」是Husserl提出的重要觀點，指陳的是研究者必須對個案「本質還原」，以避免經由研究的「二度詮釋」遠離現象本身的「一度詮釋」（轉引自盧嵐蘭，2001；Blaikie, 1993: 28-36）。

<sup>16</sup> 此處所說的「互為主體的了解」指的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相互主體性。現象學者Schutz（1962）將「了解」區分為常識經驗中的了解、認識論中的了解、社會科學中的了解，並指陳「了解」的問題必須基於研究者對於自己與研究對象生活世界中的普遍經驗形式加以觀察（常識經驗中的了解），並思考這些普遍經驗形式如何形成（認識論中的了解），以探索社會秩序建構的過程

點逐漸浮現時，才運用適當的理論對個案進行詮釋。此外，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還主張研究者必須在實際研究中與所援引的理論之問題意識進行對話。本文認為以此種方式進行社會運動研究，或許比較能夠彰顯運動的特殊性，並與傳統理論導向的研究維持一種相互補足的關係。

#### (四) 建構社會運動如何召喚支持的理論基礎

從研究的關注焦點來看，社會學對於社會運動的研究隨著其理論的發展，也逐漸意識到分析運動如何召喚支持的過程有其重要性。例如：新社會運動理論的提出就具體指出運動必須提供「替代性的價值」(alternative values)，並在道德上說服一般大眾這些價值的正當性，進而召喚支持，則運動才可與既存體制有效地抗爭(王甫昌，1999；Melucci, 1989)。然而，由於社會學的理论本身並未提供可轉化為分析運動論述的工具，因此即便是對於運動論述的重要性有所認知，但是卻對社會運動的語言使用或語藝策略難有深入的分析。

有別於此，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不僅在認識論上認為社會運動作為一個抗爭的手段，必須仰賴語言文字的使用來形塑內部認同並且召喚他人的支持，所以社會運動可以說是一個傳播／溝通的問題，也是一個「語藝」的問題(林靜伶，2001，2002；Stewart, Smith, & Denton, 1994)，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還提供了細緻的分析工具，摸索社會運動如何藉由不同的論述形式(例如：論辯性的語言文字、敘事性的語言文字、運動音樂)與論述內容(例如：正當性論述)合理化運動的必要性、建立運動的道德性。所以，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事實上提供了我們關照運動如何論述自身的機會，也讓我們得以建構運動如何召喚支持的理論基礎。

### 三、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對傳播學運動研究框架的反思與貢獻

對於運動主體性與運動如何論述自身的重視，也可看出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與傳統學研究框架之差異。以下先討論過去傳播學在進行社會運動研究時的理論偏好並思考其原因，再討論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如何為傳播學的運動研究指引另

---

(社會科學中的了解)，也有助於我們理解何謂「互為主體的了解」。

一條途徑。

過去傳播對於社會運動的研究大多以「媒體中心論」的角度定義「傳播」，探討媒體如何再現社會運動（例：胡愛玲，1990；翁秀琪，1997；張桓凱，1996；陳雪雲，1990），或是以功能論的角度檢視媒體（包括大眾媒體、小眾媒體、另類媒體）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與困境（例：吳淑俊，1990；胡晉翔，1994；陳雅惠，2002；許傳陽，1991；賀照緹，1992；廖素霞，1994；羅世宏，1994）。本文認為這可能是因為當代傳播學的發展與大眾傳播媒體的興起息息相關，所以在理論建構上明顯以「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的論述為主流，據此探討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由於大眾傳播的理論論述並不是基於想把「傳播」予以理論化而研究大眾傳播，因此很少超脫大眾傳播特有的情境脈絡去深化有關傳播的核心特質的知識（黃光玉，2003），我們於是可以據此說，以大眾傳播的理論論述為主軸的傳播學是情境依附性較高的、隨著媒體本身的改變（例如新科技的高度發展）而必須隨之變動或修正的知識。

此外，在傳播學的相關研究中，少數意識到社會運動的傳播／溝通本質的研究，卻因為多半借用社會學對於運動的預設與理論框架，因而缺乏傳播學的問題意識（例：林福岳，2002；陳錦華，2002）；或只停留對個案進行單純的文本分析，未能進一步思考個案背後的理論意涵（例：李承翰，2000；趙雅麗，2001）。這可能是因為在大眾傳播為主流的傳播知識中，人們缺乏系統性的理論或概念架構足以為相關研究提供理論上的基石。

然而，在傳播學門追求正當性且積極界定其核心知識的潮流趨勢中，「人類傳播」（human communication）逐漸成為與大眾傳播分庭抗禮且互相對話的知識傾向。人類傳播主張從人與訊息的關係定義並追尋傳播學的普遍性知識，並認為媒體差異或情境變動充其量知識一個變因。所以，無論傳播科技如何進步，無論情境如何變動，人類溝通的本質、人與訊息建構、論述與知識等基本問題是可以追求的普遍性較高的知識（林靜伶，1996）。此類主張於是以「意義的共享」、「意義在什麼文化脈絡下如何形成？」為傳播學知識的核心（夏春祥，1997；陳世敏，

2002；須文蔚、陳世敏，1996）。而語藝學則被認為是人類傳播中，最具代表性的、最古老的知識之一，甚至可為當代傳播知識（包括大眾傳播）提供哲學基礎（林靜伶，2004；Littlejohn, 2002）。

當我們從語藝學思考社會運動時，語藝學的基本命題－誰在說話？說了什麼？在什麼情境／處境下說話？對誰說話？對情境造成什麼樣或什麼程度的影響？就成了社會運動研究最主要的問題意識。因此，社會運動透過什麼樣的語藝策略傳遞訴求、拓展支持基礎、取得抗爭的正當性、強化抗爭的必要性...，都是值得去分析的課題。易言之，不同於過去傳播學的理论偏好從事媒體再現的相關研究，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重視的是，運動論述的說服功能以及意義如何透過語言文字的使用而產製此一動態過程。而對此一動態過程的分析，則較有助於建構社會運動的語藝理論與普遍性較高的概念架構。

#### 肆、結語

美國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歷經了 50 至 80 年代的理论論辯，逐漸產製與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中，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幾種傾向：其一，有些針對特定議題（例如：墮胎合法化運動、環保議題）進行社會運動語藝批評，並藉由個案的分析發展出社會運動語藝批評具體的研究架構。Stewart 等人（1994）的專書《說服與社會運動》（*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從社會系統觀點、說服功能觀點、戲劇理論觀點、敘事觀點、論辯觀點分析社會運動的語藝策略使用，並摸索社會運動如何建立抗爭的正當性、挑戰既存體制，相當程度反映了近年來相關研究已經日趨蓬勃。其二，還有些研究藉由對特定的社會運動進行語藝批評，修正傳統的語藝理論。例如 Pickering（2003）以墮胎合法化運動中，「選擇權」（Pro-Choice）陣營的論述為研究對象，發現該陣營以女性的個人生活經驗為主，成功說服一般大眾從「女性有選擇墮胎的權利」這個點思考墮胎合法化的問題。Pickering 並且指出，該陣營的語藝策略明顯和傳統語藝學論辯理論（argumentation theory）中標榜舉證學者專家的話為權威證詞的說法有所不同，

足以修正論辯理論「去個人化」的缺失。此種研究以對個案進行觀察為起點，並透過與既有的理論進行對話，可以說是具體落實了社會運動語藝批評標榜個案取向以建構理論的精神。

反觀國內，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還處於起步的階段，研究重點也明顯放在對特定社會運動的語藝策略進行討論、詮釋與評估（例如：王靖婷，2004；邱紹雯，2004；陳雅惠，2001；謝文華 2002）。雖然相關研究已經逐漸意識到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的理論意涵，但是距離理論建構或理論性的討論仍有相當的差距。所以，無論從數量上或從理論意義上看來，這個領域相當值得開發。這點檢討提供後續研究作為參考。

## 參考文獻

- 王甫昌 (1999)。〈社會運動〉，王振寰、瞿海源 (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 501-536。台北：巨流。
- 王振寰 (1991)。〈社會運動的政治化及其問題〉，《中國論壇》，32(2): 41-44。
- 王靖婷 (2004 年)。〈媒體改造運動的語藝策略分析—以「無盟」的「公共化」論述為例〉，「2004 年中華傳播學會研討會」，澳門：旅遊學院。
- 李承翰 (2000)。《網際網路與社會運動團體及個人增權 (empowerment) 關係之研究》。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淑俊 (1990)。〈社會運動的發展與大眾傳播媒介的角色功能〉，《民意月刊》，151: 49-66。
- 邱紹雯 (2004 年)。〈捍衛一條公共服務的鐵路：台鐵反民營化運動的語藝分析〉，「2004 年中華傳播學會研討會」，澳門：旅遊學院。
- 林福岳 (2002)。《族群認同下的社區傳播：以美濃反水庫運動論述為分析脈絡》。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靜伶 (2004)。〈語藝學：西方發展與在台灣之現況〉，翁秀琪 (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 (上)》，頁 165-197。台北：巨流。
- 林靜伶 (2002)。《社會運動的正當性論述：連結與對抗的語藝策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0-2412-H-030-003)。台北：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
- 林靜伶 (2001)。《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理論與本土實踐的初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89-2412-H-030-010)。台北：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
- 林靜伶 (2000)。《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
- 林靜伶 (1996)。〈幾個感性與理性的想法—對〈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的回應〉，《新聞學研究》，53: 131-134。
- 林靜伶 (1993)。〈民主自由與語藝生存空間〉，《傳播文化》，1: 67-80。
- 胡晉翔 (1994)。《大眾傳播與社會運動：框架理論的觀點》。政治大學新聞研究

所碩士論文。

胡愛玲（1990）。《報紙報導街頭運動新聞之分析》。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承恕（1990）。〈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因素之探討〉，徐正光、宋文里（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頁 9-19。台北：巨流。

翁秀琪（1997）。〈消息來源策略研究—探討中時、聯合對婦運團體推對「民法親屬編」修法的報導〉，《新聞學研究》，52: 121-148。

夏春祥（1997）。〈文本分析與傳播研究〉，《新聞學研究》，54: 141-166。

陳世敏（2002）。〈提一個大問〉，《中華傳播學刊》，1: 81-85。

陳光中、秦文力、周憐嫻譯（1995）。《社會學》。台北：桂冠。（原書 Smelser, N. J. [1991]. *Soci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陳雪雲（1990）。《我國新聞媒體建構社會真實之研究—以社會運動報導為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雅惠（2001）。《運動刊物中性別論述的演變—《婦女新知》的語藝觀察》。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雅惠（2002年）。〈一場以媒介為名的「運動」〉，「2002年中華傳播學會研討會」論文，台北縣深坑。

陳錦華（2002）。《在行動中壯大自我（empowerment）：台灣網路同志運動分析》。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須文蔚、陳世敏（1996）。〈傳播學發展現況〉，《新聞學研究》，53: 9-37。

黃光玉（2003年）。〈反思媒介研究中常見的方法論問題〉，「人文後設理論及方法論的反思研討會」，世新大學。

黃應貴（1990）。〈東埔社布農人的新宗教運動—兼論台灣社會運動的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2, 3): 1-31。

張茂桂（1994）。〈民間社會、資源動員與新社會運動：台灣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論志向〉，《香港社會科學學報》，4: 33-66。

- 張桓凱 (1996)。《滅族恐慌的建構－草根組織和新聞媒體對蘭嶼反核廢運動的意義建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靜倫 (1999)。《顛簸躓仆來時路－論戰後台灣的女人、婦運與國家》。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傳陽 (1991)。《大眾傳播與社會運動：一個議題傳散模式的初探－以宜蘭反六輕設廠運動之新聞報導為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游任濱 (2001 年)。〈社會運動網路發展史初探－以南方電子報為例〉，「傳播社群與社會整合研討會」，政治大學。
- 賀照緹 (1992)。《小眾媒體、運動文化、權力－綠色小組的運動形式及生產條件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鄒川雄 (2005)。〈生活世界與默會知識－詮釋學觀點的質性研究〉，齊力、林本炫 (編)，《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頁 21-56。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 楊國樞 (1990)。〈「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研討會」總結報告〉，徐正光、宋文里 (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頁 311-325。台北：巨流。
- 廖素霞 (1994)。《台灣社會運動與另類影帶之研究：1986-1992》。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雅麗 (2001)。〈民進黨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新聞學研究》，68: 151-192。
- 盧嵐蘭 (2001)。〈真實與詮釋〉，《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7(4): 47-58。
- 謝文華 (2002)。《客家母語運動的語藝歷程 (1987-2001)》。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謝高橋 (1982)。《社會學》。台北：巨流。
- 魏書娥 (1991)。〈挫折與轉進：訪蕭新煌教授談兩年來的台灣社會運動〉，《中國論壇》，32(2): 58-61。
- 蕭新煌 (1989)。〈民間社會的「反支配」性格：社會運動本質的界定〉，《中國論壇》，28(7): 60-64。

- 蕭新煌 (1990)。〈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分析架構〉，徐正光、宋文里 (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頁 21-46。台北：巨流。
- 羅世宏 (1994)。《後蔣經國時代的國家、主流報業與反對運動：國家認同議題的媒介框架分析》。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顧燕翎 (1987)。〈女性意識與婦女運動的發展〉，《中國論壇》，23(11): 41-54。
- 顧燕翎 (1993a)。〈從週期理論與階段理論看我國婦女運動與女性意識發展 (上)〉，《律師通訊》，169: 25-32。
- 顧燕翎 (1993b)。〈從週期理論與階段理論看我國婦女運動與女性意識發展 (下)〉，《律師通訊》，170: 64-73。
- Andrews, J. R. (1983).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34, 67-69.
- Black, E. (1980). A not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rhetorical criticism.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44, 331-336.
- Blaikie, N. (1993). *Approaches to social enqui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ower, J. W., Ochs, D. J., & Jensen, R. J. (1993). *The rhetoric of agitation and control* (2nd ed.).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 Brock, B. L., Scott, R. L., & Chesebro, J. W. (Eds.) (1990). *Methods of rhetorical criticism: A twentieth-century perspective* (3rd ed.).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K. (1997). Dramatism. In J. L. Golden, G. F. Berquist & W. E. Coleman (Eds.), *The rhetoric of western thought* (6th ed.) (pp.195-203). Dubuque, IA: Kendall/Hunt Publishing.
- Burke, K. (1969a).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ke, K. (1969b).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thcart, R. S. (1990). Movements: Confrontation as rhetorical form. In B. L. Brock, R. L. Scott & J. W. Chesebro (Eds.), *Methods of rhetorical criticism: A*

- twentieth-century perspective* (3rd ed.) (pp. 361-370).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 Cathcart, R. S. (1980). Defining social movements by their rhetorical form.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31, 267-273.
- Cathcart, R. S. (1972).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movements: Defining movements rhetorically. *Western Speech*, 36, 82-88.
- Crandell, S. J. (1947). The beginning of methodology for social control studies in public addres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33, 36-39.
- Fishman, D. B. (1999). *The case for pragmatic psychology*. New York &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Griffin, L. M. (1969). A dramatic theory of the rhetoric of movements. In W. H. Rueckert (Ed.), *Critical responses to Kenneth Burke* (pp. 456-47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riffin, L. M. (1951). The rhetoric of historical move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38, 184-188.
- Jenson, J. (1985). Struggling for identity: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the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8, 5-18.
- Leff, M. (1980). Interpretation and the art of the rhetorical critic.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44, 337-349.
- Littlejohn, S. W. (2002).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7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Mauss, A. L. (1975). *Social problems as social movements*.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McGee, M. C. (1980). "Social movement": Phenomenon or meaning?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31, 233-244.
- Melucci, A.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Nichols, M. H. (1997). Kenneth Burke and the "New Rhetoric". In J. L. Golden, G. F. Berquist & W. E. Coleman (Eds.), *The rhetoric of western thought* (6th ed.) (pp.180-189). Dubuque, IA: Kendall/Hunt Publishing.
- Philips, S. D. (1991). Meaning and structure in social movement: Mapping the network of national Canadian women's organization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XXIV, 755-782.
- Pickering, B. A. (2003). Women's voices as evidence: Personal testimony is Pro-Choice films. *Argumentation & Advocacy*, 40, 1-22.
- Schutz, A. (1962). *Collected paper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Sillars, M. O. (1980). Defining movements rhetorically: Casting the widest net. *Southern Speech Communication Journal*, 46, 17-32.
- Simons, H. W. (1972). Persuasion in social conflicts: A critique of prevailing conceptions and a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Speech Monographs*, 39, 227-247.
- Simons, H. W. (1970). Requirements,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A theory of persuasion for social move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6, 1-11.
- Smith, R. R. (1980).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social movements.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31, 290-297.
- Smith, R. R. & Windes, R. R. (1975). The innovational movement: A rhetorical the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1, 140-153.
- Stewart, C. J., Smith, C. A., & Denton, R. E. (1994). *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3rd ed.).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 Taylor, V. (1989). Social movement continuity: The women's movement in abey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761-775.

Wilkinson, C. A. (1976). A rhetorical definition of movements.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27, 88-94.

## **Rhetorical Criticism of Social Movements:**

#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in Western Thought and its Meanings

Hsiao-Yung Wang\*

## 《Abstract》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has long been influenced by sociology. Sociological movement research, focusing on macro and historical level, can not isolate the communicative and persuasive component of social movemen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ocial movements are rhetorical nature because movements are carried forward through language, both verbal and nonverbal, in strategic forms that bring about identifica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the movements. This paper first re-reads and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rhetorical criticism of social movements from 50s to 80s in America, and rethinks it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this paper presents four important findings, that is rhetorical criticism of social movements: (1) supplies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efinition about sociological movement research; (2) faces the complexity with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movements squarely; (3) keeps near to the specialty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4) constructs a theory to analyze how social movements have invoked identification and why. This paper ends with suggestions for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sociology and communication fiel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discourse, dramatism, hermeneutics, rhetoric,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sociology

---

Hsiao-Yung Wang is a Ph. 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ail: hy1227.wang@msa.hinet.net